

# 新世纪女性文学的缺憾与未来趋向

刘巍

**摘要:**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的性别意识的探讨逐渐由上个世纪的激进走向平和、平面走向深入。尽管从目前来看,女性文学仍存在着诸如个性意识凸显、注重感性书写、历史的完整感缺失等方面的缺憾,但女性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正在以雍容大度的优雅姿态寻找文学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女性文学;文学缺憾;两性和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突破了时代政治的大一统而凸现出性别意识,一些受到女性主义影响的作家在创作中建构女性主体性,在探讨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关系的问题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只是由于当时人们正在热衷于“人”的讨论,热衷于表达属于原发性的经验理解,因而理论性阐述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兵分两路,一些女作家运用自己的性别资源进行“躯体写作”,而另一些女作家则厌倦了女性的徽号,希冀穿越性别之门重归传统,殊途亦未同归。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试图找到一条适合女性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可以使文学的性别意识加以强调,催动女性反思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女性文学向着和谐、科学的方向发展。近十年来,作家们几乎都用各种书写形式表达自己对女性文学的反观。由于她们大都在文化素养方面有学院背景,因而她们的思考,既具有当下的亲证性,又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建树,在优雅的女性立场上,多层次多方位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本体特征及其意象结构与话语模式。如果说80年代至今的女性文学完成了从女性无意识到女性意识的觉醒、男权中心和女权主义两难中的困惑,那么新世纪就是要进行人类整体性别意识对单一性别意识的超越,纠正女性研究过程中的偏激、偏离的情绪与方法,摆脱固有话语模式研究的藩篱,走向建构性别和谐乃至社会和谐轨道上来。

无论是为自身解放,还是为追求真理,文学始终表现着最丰富、最精细、最生动的性别意识。性别的存在同人类历史一样长久,男女性别的差异同人类的文明史比肩而立。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地积淀在人类心理深层和日常生活中的性别观念和无意识状态,这种生活化、心理化的特征带来了它与文学天然的联系和亲和力。但是数千年来,文学的性别意识一直混沌不显,文学无法做到对性别本质的关注,无法表现性别化的发展历程。反思文学最早表现出了性别意识的旨趣,比如《我是谁》、《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等作品都肩负着对女性启蒙的责任,在对极“左”思潮和路线戕害人性的批判中,对性别的反思也同样

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意识。但遗憾的是,女性对性别的审视在试图获得哲学和美学本体论意义的时候,“女”字似乎偏离了社会实践意识和理性品格,被大大延伸,甚至走向了误区——比如我们常常会说起的传媒操控下的“躯体写作”,美女作家对身体的肆意书写已经悖离了张扬女性主体的初衷。徜徉于大众传媒时期的女性写作使我们看不到能够激荡人类心灵的佳作,陆文婷式的为家庭为事业积极进取的女性越来越少,叶知秋式的奋斗向上的女性人生越来越多地沦为依傍男人肩膀顺势而上的“完美情人”,女性文学在时代的浪潮中似乎很随意地就放弃了宏观的历史叙述和对文学史语境的书写。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回顾女性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缺失:

首先,在个性意识和社会群体命运的两极中,女性鲜明地张扬对自我人格的迷恋和崇拜,而忘却了对于“大众”的感念。依附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宏伟叙事成为群落性的乃至个体性的艺术表达,更多地显现出个人化的体验和个人性的艺术风格。写作立场向个体经验位移,一批年轻作者毫无掩饰地将个人的内心体验示人,文学显示了从未有过的个人化和自传性的特征。文学的确是提倡个性的,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力,正是由于个性的存在才使得这一艺术样式能在千百年来仍旧魅力依然。但个性和自我到底有没有或有多大的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反思文学对个性意志的倡导是对十年内乱泯灭人性的反驳,从而具有社会内容和历史价值的话,那么在后来女性作家的某些作品里,这种社会历史的高蹈被忽略了。《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作品作为先导树起了反叛社会群体意识的旗帜,事隔十年后的《上海宝贝》、《彼岸花》延续着在文化上进行的反传统的写作。个性的冲动使她们的小说任意又任性,她们不愿去“幽唱群体观念和忧患意识”,去承担社会责任,去关注普遍的人生,而是强调人生的自我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天然价值。这种不分善善恶贬的个性张扬和对社会主流的盲目逃离导致了文学主题的蜕变。2006年,被称为“青春疼

痛文学”的饶雪漫推出了《左耳》；2007年，王安忆推出了《启蒙时代》，池莉推出了《所以》，几部作品虽然故事和人物迥不相同，但却有一个相似相近之处，那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中，描述个人的成长史。当体验了强烈的个体扩展欲望而处于生命的巅峰状态时，主人公体验的不是自身生命的饱满，而是人生意义的空虚。我们在作品里看到那种反复出现的生命恍惚感，人生意义的模糊和精神上的漂浮，对生命的肯定和拥抱变成了对生命的怀疑和否定。我们在肯定女性文学纯情的气质、纯美的形式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她们对生命终极的漠视，作家的文本世界应该在显示出生命脆弱的同时也表达对生命的尊重，比如铁凝，“她的小说很少直接写到死，尤其是非正常的死——这也可以理解为铁凝是一个对人的看法并不灰心和绝望的作家……（她）一般不让自己的主人公亲历死亡，也不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生活再难，也总让他们存着活路和希望。”<sup>①</sup>文学应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有血有肉，人生的欢笑和哭泣、呼吸无所不在的挚爱；文学更应该表现的是历史中灵魂的渴望与追寻，演绎出在命运车轮下承受碾压的人生的悲叹与哀告；尤其是，在无限瑰丽、辉煌的背景下展开的人生到底在超越什么、创造什么、皈依什么？而在这些方面，女性文学实现了她的价值和意义吗？

其次，在感性的自然生命和理性的社会生命之间，一批作家把旨趣指向了前者。女性作家本身就对身体有着特殊的敏感，更善于关注与表现女性私人经验，这些经验中基本却深刻、悠久而现实的一种，便是对性欲望的体验。女性欲望是女性的潜意识、女性的愿望和要求，是生命的欲望与创造的欲望、性的欲望和话语权力的欲望。女性的自然生命欲望是女性隐秘历史经验，为时间和文化所遮蔽，在女性自身的“容器”中积累、沉默，它们的持续和恒久恰恰意味着女性愿望和欲求的深度、多元及绵亘。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定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自然生命活力的适当呼唤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畸形文化形态中的人性异化有一定作用，比如“五四”时期郁达夫那一卷激起千层浪的《沉沦》，不仅具备文学史的意义，更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但女作家极端地用感性生命形式去颠覆文明理性和社会规范就显得荒唐了，本能的自由释放和宣泄是不可能启人理性、智慧和睿智的，不可能给人们指明生活的真理和社会的前景。相反，女性文学对自然自在的生命流动状态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导向了生命的非理性，在当下的许多作品中，人的理性光辉熄灭了，文明的属性被剥离了，生命的原初欲望熊熊燃烧。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出现了“饥饿的郭素娥”的翻版，她们是一群“纯生命的人”，她们体验生命的存在，在生理本能欲求的极度放纵中得到生命的快适。她们多是都市的宠儿，耽于感官享乐，被各种欲望包围，从内心里嘲笑文明规范和准则，在生理本能的释放中傲视社会却被社会抛弃在边缘，喧哗过后就是无尽的孤独和寂寞。对感性自然生命的过度书写，也会造成在男性消费眼光的窥视下女性本身蜕变为女

性自我的异化这一事实。受市场利益原则驱动，某些女性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女性欲望演化为取悦男性欲望的工具，通过自我客体化、自我奴化来争取为男性中心文化所消费，从而达到畅销的目的。

当代文学创作中仍普遍存在男性中心意识、存在以女性为消费品的性别奴役观念。这就亟待建立起主张男女主体性平等、并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差异性的人文价值观念，并以这一观念来指导社会的文化生产。应该承认，只要摆正指导思想和创作心态，我们的作家对于生命力和感性是可以也应该给出道德理性的评判的，在颠覆过往对女性不公的同时也是需要建构未来的男女和谐的。

第三，被表现的历史不具有连续完整性，而只是一些断片。女性作家在写作中缺乏深刻复杂的历史意识，少了原先的宏大的历史观，无力在历史 现在的多元对立关系中来展开叙事。女人当然是有能力表现历史的，比如“五四”时期的陈衡哲，她所编撰的《西洋史》在内容和分析上都采取了独特的女性视角。这部历史教科书表现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不仅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提供了女性历史观的独特价值导向和意识阐释；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的沈祖棻，书写的风格激越中有细腻，柔美中更有粗犷，堪称历史写作的典范，“不是只能蘸着香脂腻粉，写一些空虚平庸的少女伤春，而是蘸着风雨尘沙，把无边的烟柳斜阳，故国山川，一起写进浩荡春愁里去。”<sup>②</sup>凌力的鸿篇巨制《少年天子》以其开放的结构、细致的叙述深深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可惜这样的作品仅在文坛上昙花一现，下文难再。也许是生活经历使然，也许是创作资源不足，历史成为负担。女性文学更多的是面对“现在”写作，也就是“现在式”的叙述方式，文学叙事热衷于捕捉生活过程和场景，制作生活的奇观，却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力不从心。女性文本中很少涉及大时代，社会国家党派等大问题，她们撰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侧重的不是历史的政治化内涵，而是世俗化的内涵，写家族盛衰史，民族风情史，时代风尚史，社会心理史。“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sup>③</sup>女性写出的历史是通过女性的视角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与评说，是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写出的不同的历史。她们更看重的是“女人经历的历史是怎样的”，更尊重女人的经验和感悟。

第四，表现生活而不是评价生活，表象式的拼贴，不是本质式的书写，缺乏深度价值探询。似乎是女性作家书写文本的意义仅仅在于带有女性审美韵味的形态呈现，而心甘情愿地将形而上的判断任务交给了男性。事实上，本质评价的缺席反而造成了女性作家书写的表面化、平面化，表现力单调而缺乏创新的动力，无法把对生活的有力表现与更高水准的艺术方法结合起来。在这里，原生态的写实并不能当做推动文学改革的借口，崇高优美一类的美学风格已很难找到，只在极少数的作家（比如毕淑敏）笔下留存。王蒙在《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中一方面肯定张洁的《无字》是作者“用生命书写的，通体透明、惊世骇俗”的

一部力作,同时也指出,书中充斥着太多的愤懑与怨恨,仿佛时时处处都在发泄与声讨——这就不是雍容大度的女性声音。文学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但文学更应是对生活的梦想和追求,否则作品就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而不是小说、诗歌等文学样态。作家有言说的权利,也应保持个人的艺术风格,但创作出的作品是给人欣赏的,供人愉悦与思考的,所以作家应避免将作品单一作为精神宣泄的工具,要用开阔的胸怀、开放的眼光,为读者提供审美的素材和精神栖息的园地。当然,大多数的作家在做出努力,转变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林白,在《妇女闲聊录》里她却冲破了跻身文坛时自我封闭的空间,以木珍“介入者”的身份,几个妇女“闲聊”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妇女故事”。她们在一起进行了毫无禁忌的、毫无修辞的、甚至是毫无章法的叙述,实现了女人“说话”的最高境界。“《妇女闲聊录》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像一株野生的植物,蓬勃、顽强,它自己拔节,按照自己的样子生长,谁都不能修剪它。在叙述中,你不得不变过分的主动为有节制的被动,把自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融为一体,复制他人的狂欢从而获得自我的狂欢。而狂欢精神正是我梦寐以求的。”<sup>④</sup>这样的转变应该是成功而及时的,也是值得推崇的。

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为各种非文学的利益所支配,无法完成对自身的深度刻化。对于当今的女性文学写作而言,要搞清楚女性写作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未来在哪里?纵观来路,女性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的精神痛苦和生存艰难,但对如何摆脱和追求什么她们并不清楚,讽刺在于她们追求的往往正是她们反对的,终点回到起点。也许书写的意义仅在书写本身,在于过程,终极的价值和答案的肯定是徒劳的。女人的确一直都在试图争取“权力”,但所谓的“女人的权力”,并不是女人要去做男人的事情,而是女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合情合理地发展,女人和男人携手并肩去描绘人类社会的阴阳共和图景。

第一,优雅地飞翔。要想优雅地飞翔就要先反观自身,也就是要反思一下惯性的女性思维。我们首先要承认,女人是人,是同男人一样有血有肉、有爱有憎的人。就如丁玲说的“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会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sup>⑤</sup>两分法的观点似乎是女人要么是完美无缺的天使要么就是一钱不值的女巫,这种先验的观念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或是回避女性的弱点,或是自己毁灭女性,这当然是偏颇的。例如张洁笔下《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具有无穷思爱的境界,对自己为男人的付出和一生的蹉跎没有一丝怨恨;《方舟》中的三个女性在事业上都是出类拔萃,她们不幸的境遇都是男人造成的,作者也不去追究她们自身的责任;而《红蘑菇》中的梦白,《她吸的是薄荷味的烟》中的女舞蹈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女性也变得丑

陋,走向自我的毁灭。我们很难在张洁笔下找到一个比较“中庸”的女性形象——既具有女性的优点,也具有女性的弱点,并且没有与男性走向对立。她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这方面法国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女权运动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西蒙·波伏娃的研究则令人钦佩。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问题,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认可和支持,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辅佐一样。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男人和女人无法相离、互不相弃又彼此欣赏、比翼双飞。

文学芳草地的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话语权力的限制应该是内化的而不是外延的。这种自由与限制的平衡需要依靠作家经年累月的磨练和心性的不断修养来实现,最终可以将优雅的审美观内化为自己的话语规定。埃莱娜·西苏说“飞翔是女性的姿势”,女性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意在以一种客观的、温和的、现代的立场来阐述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女性写作的发展方向便是在葆有新的女性体验的同时,向着更为广阔的精神维度展开。女性文学更应注重生存的细部纹理,体验更为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艰辛,同时也要表达新一代女性灵魂和生命体验的扎实可靠。由此可见,女性更应该是从主体性出发,将对性别、阶级、民族的内涵关注并重,以女性独立的精神姿态和领悟力去处理生存的各种问题,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再比男女在个人水平上的差别更重要了。

第二,破与立的平衡。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坚持女性立场,反男权中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女人只是简单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女性中心论的旗帜就不对了。凡事不能矫枉而过正,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往往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女性中心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颠覆男性的审美标准、摒弃男性、丑化男性等方面。从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作家开始,女性文学就开始将作品中的男性设置成了配角,女性取代了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之后,张洁等女性作家继续剥开男性华丽的外衣,暴露其丑陋和软弱;到林白、陈染更是不留情面,甚至激进到“同性恋”题材,企图将男性从两性的世界中彻底踢开。由此可见,女性作家从追求两性平等对话的良好愿望开始,却走进了两性对立的死角,并体现出一定女性一元的倾向。

既然性别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走向男女共和,那么就有必要加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发表出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理论等方面的内涵、特性,从而更加科学、全面地展现女性研究的形态。对男性应该有诗性的关照,应以雍容大度的姿态而不是泼妇悍妇的斗争气势出现。性别不是一切,它只是作为文本创造者和研究者的一种类属

身份,它不能单纯地来解释文学,就像不能以阶级来解决一切矛盾一样,仅此一点,它就不具备方法论的价值尺度。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反复强调“任何人若想写作而想到自己的性别就无救了”,“只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她就无救了”<sup>⑥</sup>,她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性别简单化和绝对化。那样的话,性别将不再是合理有效的分析范畴和阅读视角,将会成为限制、禁锢我们的一个新的牢笼。所以我们应该把握的尺度是有性别而不为性别,注重性别而又超越性别。

在携手解决人类共同的灾难之际——比如海啸地震、能源危机、种族歧视、恐怖组织、金融风暴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显得多么渺小。其实除了性别特征,作家主体可能还面临着更为重要的问题。从更高更广泛的层面上讲,性别的差异性只有与人类的普遍性相联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真正伟大的写作应该是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而达到人类的认同,从而回避单一的性别视角,更多地描绘人类的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生存困惑、普遍的生命情感。确立新的女性话语理论和模式,使女性不是处于“自说自话”的孤军奋战的状态,从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实现阴阳和谐的太极图,始终是我们明确的追求目标。

第三,坚守和谐的性别观和审美观。男性和女性是造物主的恩赐,没有两性就没有这个世界的生生不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形,以球形出现的无论如何颠覆皆不可改其形义的无分上下左右位置的阴阳互生、化生万物万象的图像,正体现了这一历史的必然诉求。两性和谐是社会理想,同样也是文学理想、写作理想,希望文学能够达到两性精神和心理的文化认同。男女的差异不再是压迫和霸权的借口,而是各自的优势,相互吸引的磁石,两性之间不应该是厮杀不休、两败俱伤,而应是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男性和女性应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将人类的生存境遇提升到更完美的层次。在这种两性和谐的土壤中,女性作家更可能跳出性别的局限,实现与男性话语的接轨,达到两性和谐的文学理想。

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应避免两种极端的错误观点,一是性别一元中心主义的论调,另一种是单纯追求平等,而忽视两性差异的观点。一元主义性别论就是我们所说的男权中心主义或者女权中心主义论。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世界上最自然、最朴素的一对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世界、共同繁衍生命,缺少男性或者缺少女性就都不会有这个世界的生生不息。所以说,男女本没有重要与不重要、优秀与低劣的差别。无论是男权中心主义还是女权中心主义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态度,都是将对方推向绝境也将自己推向绝境的危险观念。性别一元中心主义论带给人类的只能是孤寂、恐惧、绝望和灭亡。单纯追求两性平等,而忽视两性差异的观点也是错误而危险的。追求两性平等是美好的愿望,但这种平等必须建立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不承

认差异的平等只会消灭二元平衡,造成畸形的一元现象。我们已经说过,男性和女性没有孰优孰劣,但却存在着差别,这是生物学的差异,也有历史和社会性的差异。两性差异是自然的造化,也是其相互吸引的基础,因为有了两性差异,两性才会成为异性眼中的风景。平等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男人化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化的男人。女性和男性必须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差异,势必造成世界一元的畸形现象。女性文学不论是探讨文学的生产、消费、性质还是功能,都应考虑如下因素:第一,新时期的文学观统摄下的书写固然要突破传统而有所创新,但它必须接续几乎断裂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命脉,汲取那些对今天来说仍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尘封的但并未死去的源泉;第二,与世界接轨并非大量引进、陈列或镜像式的上演各色的洋概念、洋观点,应有放弃地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理论,在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念。

女性话语的意义在于她们提供了中国女性生存的本真状态,向未来展示了她们在面向现代西方之际所面临的艰难的选择:她们如何在取得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重新定位既定的、先验的传统命运,如何打破与扰乱原有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秩序,又如何试图在现时的两性过渡时期寻找一种新的男女认同的关系图景。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说女性的反叛,先验的假设往往框定了她们的思维,对男人的批判或不屑成为定势,而这样是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欠缺的不是女人不应该怎样,不是拆解而是建构,建构和谐的文学框架,这一框架具备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是战争,也不是独白,而是对话沟通,在新世纪逐步建立男女平等、和谐共存的两性关系才是重要的。男人和女人就像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月亮,是阴阳相符、两性相合、缺一不可的。“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sup>⑦</sup>

#### 注释:

①谢有顺:《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铁凝《第十二夜》,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②舒芜:《沈祖棻创作选集·序》,沈祖棻《沈祖棻创作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③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④林白:《低于大地——关于〈妇女闲聊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⑤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⑥[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怀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8页。

⑦迟子建:《我的女性观》,《听时光飞舞》,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黄莲